



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的最新材料与  
评述

# 回顾 反思 教训

# 目 录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布尔拉茨基 平凡译(1)

障碍机制及其实质和消除途径

..... 布坚科 荫夫译(17)

人与象征

..... 古谢伊诺夫 鲍里索夫 何直译(33)

历史进程是多维的

..... 波里亚科夫 高祖源译(53)

农业集体化是怎么回事

..... 丹尼洛夫 廷佐夫 林世昌 陶正夫译(61)

真相正在澄清

..... 齐加诺夫 采访 田娟玉译(98)

崇拜与奴颜逢迎

..... 吉尔纳江 冯绍雷译(111)

同约·维·斯大林在一起

..... 雷宾 李必莹译(125)

主席的妻子

..... 拉兹贡 魏俊英译(145)

影 子

..... 阿姆林斯基 房筱琴译(156)

“日丹诺夫牌消毒药水”以及反对抹黑

.....卡里亚金 黄窗译(172)

赫鲁晓夫

.....布尔拉茨基 曾蔚芳译(192)

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见

.....罗姆 张佩珍译(209)

送 别

.....费奥多罗夫 杨季舫译(244)

勃列日涅夫和解冻的失败

.....布尔拉茨基 赵泓译(250)

※ ※ ※

美一学者谈苏联70年来的政情

.....[美]伦哈特 陈巨山译(280)

在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之间

.....[美]托克 林淑端译(305)

#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费多尔·布尔拉茨基

平凡译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点大逆不道。但是，细想一下，它正是时下辩论的焦点。《真理报》社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1988年4月5日）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准确的表述：“我们如何尽快地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本来面貌，如何尽快地清除蒙在社会主义上的迷雾和消除畸形，如何尽快地从束缚我们社会发展，使社会主义潜力不能得以发挥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之后曾作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声明：我们要重新审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也正是这件事。首先，回到列宁去和克服斯大林主义；第二，要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已有七十多年了。同时，要注意借鉴其它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现实地看待同资本主义在技术革命时代的竞争。我认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新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此。

目前正在讨论刊登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文章《不能放弃原则》。在此之际，我想谈谈自己对今天任务的看法。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教条主义的宣言，它是保守势力在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的进攻，企图削弱我们的团结。原则是需要的，正如列宁所说，人需要理想，但这种理想是人道主义的……

改革的反对者企图利用改革初期的困难。公开性和言论自由——实现这种言论自由的人并非来自外星球，而是痛苦地经历了个人迷信、六十年代的高潮与失望，经历了停滞年代，在宗法专制的政治文化的后果没有被克服的条件下成长的——这种公开性不免要伴随一些偏激的感情、过火的言辞和不太文明的争辩。那又有什么呢？在政治（这一远古时人们就熟知的玩艺）中不存在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东西，而常常是选择一种有利方法来解决，以期得到较好的结果。我们在比较两种方法时可能会犹豫：是揭开问题呢，还是把问题掩盖起来？公开性是一把能愈合自己割开的伤口的利剑。这是谁说的？列宁！

严肃的政治家，甚至其他任何对事业负责的人都明白，把问题掩盖起来，就等于把它堵在内部，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揭开问题，就等于开始解决它。难道过去，在个人迷信年代，没有坠毁过飞机，没有相撞过火车，没有发生过民族冲突？都有过。但无论发生什么都一声不吭，沉寂得象墓地一般。可现在国家要为几十年的沉寂付代价。公开性是人民的镜子，人民并不害怕它。因为早在古时候人民就创造了一句谚语：对着镜子没什么可抱怨的……当然，应当改变一下社会本身的形象，使之没有可向镜子抱怨的素材。

公开性与现实经济成果还很少的这一事实之间有一种不协调，保守势力想钻这一空子。但对创新改革进程缓慢首先要负责任的正是保守势力。他们尽其所能地用各种直接手

段或间接手段抵制合作社、家庭、班组、作业队承包和个体劳动的发展。这些形式本来是不需多大代价就可以迅速见效的。在三年中我们仅成立了几万个合作社，这只不过是海里的一滴水。但是他们，这些低级的托利党党员（托利党是英国17—19世纪的保守政党。译者注）一方面阻挠进步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发表危言惑众的言论。

《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文章在一个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这篇文章的作者挑衅地和不加掩饰地捍卫斯大林的思想遗产。改革的暗敌似乎更想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即所谓的两线作战——既反对过火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又反对公开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并未得逞。这再一次表明，改革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软弱、无重心的勃列日涅夫政策谁都不满意，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的反对者现在公开站出来讲话。他们似乎已感觉到，改革已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它已深入我们的人民和社会关系的灵魂和血液中。所以，他们准备决战，企图搅乱我们的社会意识，在落后的社会势力中寻找支柱。

·《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文章的作者认为辩论的核心主题是关于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其实不然！类似的问题是三十年前，党的二十大期间辩论对象。实际上，当时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明确的结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之后，这一结论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并且，随着中央政治局调查委员会和新闻界、科学界、文学界的调查工作的进展，新的事实愈来愈多。只有那些在政治斗争中非常落后的人才刚刚为自己打开这一历史篇章。

实际上现在的核心是另外一个问题，60年代没有作出回

管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管理体制问题。戈尔巴乔夫曾指出：“我们明白，党应该表现出勇气和意志，从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主义观念打着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个人迷信时期的印记。从关于建设方法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总而言之，从一切扭曲社会主义，束缚人民创造力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塞涅卡（古罗马政治学家。译者注）曾说过：严重的错误常常会变成犯罪。斯大林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三分之一一个世纪前就被揭露和遭到批判。然而那些已深入我们管理体制的错误依然存在并阻碍我们国家前进。现在，公开为1937年大清洗辩护的人已不多了。但是，或多或少地赞同斯大林的错误思想的人还不少。因此，应该用科学的、能从过去历史中为今天吸取教训的批判来补充道义上的批判。所以，研究斯大林的那些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变形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毫无疑问，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直接从斯大林的手中接过来的，从三十年代起，我们的教育体系基础是斯大林的著作《关于列宁主义问题》、他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十四——十九大上所表述的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现行的党史、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教材和大部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都留有它们的痕迹。

在斯大林的观点影响下，三十——四十年代的经验被绝对化，它被当作讨论社会主义的准则。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文章的作者正是把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当作典范，就连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也不例外；而把“开性、民主化、经济改革和今天的改革思

想看作是偏离社会主义。更有甚者，每当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更为有效的形式时，就会有人神气地站在“纯洁的捍卫者”立场上宣布：“这不是社会主义，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矛盾”。小则斥之为滑到“资本主义”立场上去了，大则斥之为“人民的敌人”。

请看看，我们是如何怀疑地对待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和试验的。1955年，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后勇敢地承认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他在一个关于确认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权的声明上签了字。然而仅过了几年，“纯洁的”热心的捍卫者们就组织了一场对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的全面围攻，攻击他们的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尝试。

1963年，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滞留期间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情节。他在参观贝尔格莱德的一个企业时，会见了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赫鲁晓夫突然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有什么不好，我看不出有半点背离社会主义。你们有你们的形式，我们有我们的形式”。对话发表于南斯拉夫和西方报纸。我们要在自己的报纸上作点报道，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说：“我们犯不着在家里招惹鹅”（意为惹麻烦，译者注）。这些蠢鹅，因为他们的偏见和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对一切新的、能促进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东西进行攻击和拒之门外。

二十年来，我们又怎样以怀疑态度对待匈牙利的改革？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时，又有多少偏激和极端？波兰、民主德国所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又引起了我们多少公开或隐蔽的敌意？

不久前我有幸去了中国，回来后谈起那里的改革，尤其是谈了那里如何依靠家庭承包解决了食品问题，在五至六年之间使粮食产量增长了三分之一多，农民生活提高了三倍。马上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出来讲话。下面是他的原话：“当然，这一切都不错，但为取得这一切花了多大的代价？这是以偏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方法的代价来换取的。是不是为经济增长所付的代价太高了？”

试想一下，八亿饥饿、不幸、在“文革”期间为生存而挣扎的中国农民富裕起来了。这不好？那是什么观点？哪些原则说劳动人民应该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之中？我在听到这类说教时总感到，我们有些人在胡搅……

戈尔巴乔夫已说过上千遍了，任何一种体制，只要不为人民服务，它就没有权利存在。这是我们评价一种体制，首先是自己的体制的社会主义准则。同时，这也是重要的阶级原则，我们关心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收入、或者是某个精英集团的特权。只有实际上能够保障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富裕和文明，才能叫作社会主义。不能保障这些的体制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同意这么一种准则，那一切都可以理解了。中国的家庭承包至少在国家发展现阶段上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有巨大的效果。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形式，而且是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形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志愿合作社能使小麦产量达到每公顷四十公担，所以它是高生产率的形式。它使土地收成比我们高出两倍，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意味着，志愿合作社的效益要比集体农庄高。

在南斯拉夫的国家农场，小麦产量达到每公顷六十公

担。这些农场的组织形式与其说象我们的国营农场，倒不如说更象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的模式。这究竟比我们的国营农场更社会主义呢，还是更资来主义？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的个体和家庭商店、饮食店、作坊又算什么形式呢？这些店服务好，吃东西便宜。这是偏离社会主义？还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的任何一个劳动者只要有货币就可以去任何国家。这难道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评价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相似而又有区别的经济体制：计划商品经济（中国），注意市场需求的计划模式（匈牙利），市场经济（南斯拉夫）……我们不仅要评价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有益经验，而且也要注意那里发生的困难、挫折和新问题。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我国发生变形以及这种变形是如何发生的？早在三十年代就形成了两种社会主义观念，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彼此竞争。

第一种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1918—1921）。这种模式确立于国内战争的严酷岁月，但在不少程度上也反映了认为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在实践中，这种模式意味着命令、暴力、直接没收农民的产品和取消劳动产品的正常交换。

第二种模式是“新经济政策”（1921—1928），“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国营的、合作制的、私营的相互竞争，农民自由地在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购进所需的工业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主，特别是在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和地方基层充分发挥民主。在文化艺术领域百家争鸣。

且不论“新经济政策”为何以及如何被中止。我想指出

的是，在我党历史和整个解放运动中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两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

一切问题都在于，解放运动从它刚产生起就存在两种倾向的斗争：社会民主运动（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或者说军营式共产主义。这种斗争在我们的先驱那里就已开始。一方是圣西门，另一方是巴贝夫；一方是马克思，另一方是巴枯宁。马克思本人把巴枯宁之流称之为“病态的共产主义”，称之为到处否定个性和文明、产生贫穷和愚昧的军营式共产主义以及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的社会妒嫉。

在我们党内，军营式共产主义倾向非常强烈，它在落后的社会意识和宗法专制政治文化中找到了支柱。在列宁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一半人在某个时期曾拥护“左派共产主义”思想。托洛茨基足以为例。他在被流放到国外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孜孜不倦地宣传最荒谬的左倾思想。

在这方面，布哈林及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活动很值得注意。他们完全理解列宁的政治遗嘱、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观点。布哈林的观点对我们有特殊意义，对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评价，围绕着这一不平凡人物所展开的激烈争辩从未停息过。这不仅仅是人道问题，不仅仅是对受尽折磨、无辜被害的领导人的同情和为他难过的问题。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斯大林的工业化、集体化和加强国家工业和国防力量的方法是否是唯一的选择。

照通常所说，历史没有假定式。存在的已经存在，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但问题决非如此。我们只需提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如果列宁再活10—20年，难道国家会遭受1937—

1938年的磨难？不，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在生活中出现！可以再从另一方面提个问题：如果十三大执行了列宁的直接指示，解除斯大林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那又会怎样？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会更平坦、更人道，我们的发展会更有效率。还有一个取之于实践的证据：在中国，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功地取代毛的直接继承人华国锋而登上领导岗位，开始实行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难怪在中国不断地出版和再版布哈林的著作，因为那里深刻理解取代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另外选择。

作为“剥夺者”小组成员的斯大林从最初开始政治活动时就具有左倾倾向，倾向于恐怖主义方法。因此他不理解或有意地推翻了作为“新经济政策”（而不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旧经济政策）基础的列宁遗嘱。

在二十年代初，斯大林就认为有必要为自己作些理论铺垫。现代读者可以看看他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这本著作是由列宁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加用“斯大林文体”写成的提纲式注释构成的。

很容易发现，斯大林渐渐地、开始是不太明显地，以后愈来愈不加掩饰地篡改、转移了列宁论述的重心。重心的转移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逐渐而又坚定不移地突出了一个主要思想——崇拜暴力。革命、经济社会化、文化管理及其它一些社会改造在斯大林那里都是暴力的同义词。这给实现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方法，党内斗争形式和整个社会改造过程投下了一个残酷的阴影。所以毫不奇怪，斯大林很不恰当地在我国历史中诸如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这类人物身上寻找自己时代的发展经验。斯大林在他们的经验中找到了要国家强大就必须采取最为残酷的方法的根据。

但是与彼得大帝类比恰恰对斯大林具有讽刺意义。彼得大帝并非社会主义者，他当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国家摆脱落后，而人民的富裕与文明他则置之九霄云外。斯大林关于国家强大和领袖作用的观念有三分之二取之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而并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把几百万农民驱赶到西伯利亚，把一部分农民送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拥有3——4头牛和马。似乎劳动人民生活得愈好，国家就应该愈多地去限制他们，惩罚他们。而斯大林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

1939年，在经过党内外大清洗之后，斯大林在十八大上宣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刻来到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他没向我们讲清楚。是大家都能吃饱肚子，还是全社会平等？是什么平等？需求平等？能力平等？还是机会平等？这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一整代人必须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牺牲品。这种政策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企图使集体农庄国有化和大规模使用犯人劳动。

到了晚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又回到了他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式。他把向产品直接交换、逐渐取消商品和劳务报酬、限制和最终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阶段过渡作为直接任务提出来。他那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以改造过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思想~~成了价格体系完全扭曲、经营不善、破坏经济发展比例的理论依据。

相信国家暴力怎么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对此托洛茨基已作了回答。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形象地比喻为灯泡。灯芯在临灭前一瞬间的闪光特别亮。这

被形象地解释为：国家暴力在国家即将消亡之前应该达到最大限度。正如我们所见，每种乌托邦思想都有自己的伪科学。

斯大林悄悄地剽窃了这一思想，而在实践中却毫不掩饰地遵循这一思想。大家都记得斯大林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抵抗愈来愈强，阶级斗争就愈来愈尖锐的思想。这难道不就是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投下了残酷“闪光”的灯泡吗？

斯大林尤其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能看清他思想的错误。斯大林亲自作了许多决定，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批判文学，电影、艺术活动家的政治运动。人道主义、异化和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等问题在他眼里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斯大林所制造的个人迷信意识，他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军营式乌托邦思想都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也在东欧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消极反映，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斯大林在广泛的社会化与国有化之间划等号，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简单化、庸俗化。开始是工业企业从属于国家管理，接着就发生了事实上的集体农庄国有化。

国有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被逐渐推广到整个精神领域和对文化、出版、学校、医院、体育等方面的管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么一个事实：管理人员本身都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面挑选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根源了。

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早就预见到发生这类错误的可能性。简而易行的国有化的诱惑力很大。所以经典作家对此提出了

警告。恩格斯写道：“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并不解决冲突，但它包含解决冲突的形式手段和可能性”接着他又幽默地写道：“如果国家烟草专营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无疑可以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

斯大林之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克服了斯大林的两个错误：相信暴力的绝对力量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想。赫鲁晓夫是最后一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然而，斯大林的主要思想——“国家社会主义”至今仍未动摇。我把这一概念打上引号，因为觉得这种表述只是近似的、假定的和不太确切的。但正是斯大林，而非列宁，提出了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也非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国家？！而国家什么也不生产，既不生产面包，也不生产鞋子、机器和书籍。生产这一切的是人民，国家只起调节作用，或好或坏地调节生产过程。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位未许诺在一代人期间建成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但他完全相信国家万能，相信国家的组织潜能。他走上国家领导岗位后，认为只要克服赫鲁晓夫的“浮夸”，回到原来的形式，事情就可以办好。他比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更对“组织效能”抱有幻想。难怪他在位时部委达到了一百多个。就连斯大林时期也只有它们的一半。

迄今为至还有人相信事无巨细要由国家最高管理层来作决策。我们的任务在于把每一个生产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置于新的条件下，刺激他们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调动个人积极性。

《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文章的作者力图制造一种社会主义面临危机的印象。如果说到危机，那么，面临危机的不是

整个现代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形式之一——“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形式现在已走到了尽头，在技术革命时代暴露出自身的低效率。在非常条件下，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高度集中的国家强制手段在动员资源和集中力量等方面曾发挥过作用。现在这种形式已成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这种形式应该改造，逐渐地、有计划和慎重地改造成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我们暂且把它叫作“全面的、自治的社会主义”。

该想一想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国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资源，有热情饱满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而迄今为止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缺乏食品、衣服、住宅、书籍、电影……显然，社会主义还不完善，而人民需要的是完善、非常完善的社会主义。人民需要的不是斯大林的“军号”，不是领袖的丰碑，而是正常、文明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集中的国家领导将消失。完全“拆卸”国家机器的思想是荒谬的，这在当今国际国内经济、信息、人际联系日趋复杂的条件下尤其如此。但是，这意味着国家的大部分政权、职能、权力、特权应该转让给国民社会以及社会机构。首先是转让给劳动集体——厂矿企业、合作社、机关、创作协会，转让给社会团体及其它在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机构。社会应当承担起国家在极度复杂的任务和官僚主义重压下所承担的工作。

再说，资本主义已经历了各个改造阶段：十九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然后是二十纪上半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在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它又表现为某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暂时还没有恰当的名字。资本主义不断地换

皮，所以大概要腐朽很久……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那么多要回到路易一拿破仑、俾斯麦或希特勒、墨索里尼时代去的教条主义者或直率的傻瓜。这就是到处都讲实用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处之一。

戈尔巴乔夫曾指出，社会主义是具有首创精神的人的社会。而对“国家社会主义”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它束缚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最先是个人积极性为集体牺牲，然后是集体积极性为管理机构牺牲，最终管理机构本身的积极性也被压制下去。这个金字塔形的机器愈来愈把积极性集中到权力顶端，最后集中到领袖或首领手里。结果形成如下局面：工作人员不管有什么问题，不管有什么倡议，他必须穿过由命令、指示、传统习惯组成的层层屏障。由此产生了一个痛苦的事实：任何主动都要受惩。这种事情谁未亲身经历过！

结构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对积极性不是惩罚而是给予奖励。你去同人们交谈一下，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把我们从监护中解放出来吧，让我们自由地工作！戈尔巴乔夫在乌兹别克说，集体农庄庄员代表会议上这种呼声之强烈使他感到吃惊。这种呼声在被各种禁令捆住手脚的工厂、科研机关、学校、创作团体中到处都能听到。它发自每位发明家、合作社社员、艺术家的肺腑，发自每位想施展自己天赋的公民的肺腑。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最重要的理论任务和政治任务是回到列宁去，回到马克思去，回到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去。同时，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继承并不意味着用继承来限制自己。马克思乘坐的是四轮驿车，列宁乘坐的汽车今天只能在博物馆见到。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难道这还需说？只有摩西才想为他的人民制定一个永久性法律，让他们遵照它